

李翱、皇甫湜文论特色之探讨

— 對前人評價之商榷

安贊淳*

目 录

- 一、序言
- 二、二人主要文论之特色
- 三、论二人主要文论之異同兼总结

一、序言

李翱(772-841)、皇甫湜(777-835)二人雖然沒有很成功地繼承和發展韓愈在古文運動上的成就，但二人在韓門弟子中，一直被公認為是其古文成就較大者¹⁾。李、皇甫二人因同出於韓門而受到韓文及文論的影響，因此二人文論自然有一些類似之處，但又因二人本身對‘文’的見解以及從韓文文論中所吸收的成份不同，故也形成了不少不同之處。

關於二人古文的作風與文論的差異，前人已論述的也有不少，主要者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湜與李翱同出韓愈，翱得愈之醇，而湜得愈之奇崛”²⁾；《文史通義》則說：“翱得其正，湜得其奇”³⁾；而郭紹虞則說⁴⁾：“韓門二

* 韓國永進專門大學 觀光外國語通譯專攻 助教授。

1) 見羅聯添《韓愈研究》頁248,說：“案從韓愈學文的弟子相當衆多,新唐書僅列舉李翱、李漢、皇甫三人,乃認為這三人是韓門弟子中,寫作古文比較有成就的。”

2) 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50。

3) 見《文史通義》華世版 頁261。

大弟子李翱與皇甫湜，分別繼承了韓愈的衣鉢。皇甫湜論文與創作，偏向於語言的矜奇；而李翱論文，強調文以明道與語言平易這一方面”。⁵⁾

本文則將通過對李、皇甫二人文論的闡釋，觀察他們二人文論的主要特色以及二人文論之間有何異同等問題。

二、二人主要文論之特色

1、李翱之文論

我們可以把李翱的主要文論分為以下兩點來討論：1.文道觀；2.創意造言，皆不相師。而這裏如此分為兩點來討論，只是為了本文敘述上的方便而已。

1) 文道觀

對於文、道的輕重觀點本是古文家一向非常重視的問題。韓、柳的文論闡述這一層問題的也很多，但到了韓、柳以後的李翱、皇甫湜等人已不如他們那麼重視‘道’了，偶爾言及的‘道’也多已不復是韓、柳所謂的‘道’了。因此，郭紹虞所謂“李翱論文強調文以明道”⁶⁾，筆者看這只是就與皇甫湜等當時文人之比較而言的。所以筆者看來，雖然他的確在文論中說到‘明’‘道’，但是也說不上‘強調’。以下將通過有關的文論看他‘文道’觀的實際情況。

他在〈答皇甫湜書〉一文中說：

- a.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

4) 見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上）頁476。

5) 以上本文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文史通義》以及郭紹虞的評語基礎上展開，只是因為此三家在對皇甫湜和李翱的批評方面最具代表性，故引以為筆者討論之資及起點。

6) 見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上）頁476。

不會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祇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贊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迹,灼然可傳於後代,自以為能不滅者,不敢為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為本。群黨之所謂為是者,僕未必以為是;群黨之所謂非者,僕未必以為非。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名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翱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邱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叙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僕所為,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為勝也。足下以為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子則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乎?”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仆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无怪。某再拜。⁷⁾

郭紹虞說李翱論文強調‘明道’可能是就此“於道無明,故不言也。”而言,但我們看引文中的“僕口不會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祇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就可以知道“於道無明”只不過是他所以“不會言文”的幾個理由之一而已。再看他對皇甫湜之文的評語“詞高理直”以及在此〈答皇甫湜書〉末尾所矜誇的“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叙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⁸⁾,即從他舉左丘明、司馬子長、班孟堅、蔡伯喈等與儒家一向推崇的古聖賢無大相干的文人相比可知,他論文的着重點顯然在‘文’,自我矜誇的也是‘文’,如此,對‘道’的重視則相對地顯得淡薄許多了。

在〈答朱載言書〉一文中說:

b. 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⁹⁾

7) 見《李文公集》卷6,頁4。

8) 見《李文公集》卷6,頁4。

9) 見《李文公集》卷6,頁7。

作者在這引文b中表現了他對‘文’、‘行’、‘道’、‘禮’的並重態度，這看起來好像和郭紹虞所說一樣在主張文行一致、文道一致的重要性，即似乎與韓愈的〈答李翊書〉所謂“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¹⁰⁾相差不多。¹¹⁾不過，筆者認為，作者實際字面上要着重講的不是‘文’與‘道’的問題，而說的似乎是文章所寫的內容要符合古人之‘道’，但若與韓愈〈答李翊書〉所言的‘道’比較，顯然可見其範圍比韓愈所說的狹窄許多，其內容也變得很瑣碎。即就李翱而言，雖因“愛古人之道”而“學文”，但重點在於所寫的文章不違背‘道’；而韓愈所言則文章是‘道’的體現，所以與李翱以‘文’去符合‘道’者不同。由此而言，李翱在引文b中所謂的‘道’在古文中的分量已沒有韓愈那麼重要了。另外，我們配合他別的文章看，他所謂‘古人’也與韓愈所指不同，已不在主要指屬於儒家的古聖賢人了。這一點將有機會在後面補述。

此外，雖然不是專篇文論，但李翱在〈祭吏部韓侍郎文〉中論述韓文的時候也透露了些對古文的見解：

c. 嗚呼！孔氏云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於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嘗辯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儷花鬪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為，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涌雲；包劉越羸，並武同殷。六經之學，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¹²⁾

在引文c中，“嗚呼……孔道益明”就對韓愈維護“孔道”並加以發揚的成就而予以推許；其餘則均就韓愈古文的成就而言。這文中他把韓文側重於‘道’方面的“思動鬼神……得其本根”、“六經之學，絕而復新”與偏重於‘文’方面的“開合怪駭，驅濤涌雲”相提並論，並給予同樣高的贊許。“學者有歸，大變於文”則更是指韓愈古文在文體方面建立一種新的規範而言。從以上引文c的分析看，李翱對待‘文’、‘道’的態度上似乎還是‘文’重於‘道’，充其量也是‘文道’並重，而不像是重‘道’於‘文’。¹³⁾

10) 見《韓昌黎文集校注》頁98。

11) 見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上）頁476，說：“作者又着重指出了文行一致、文道一致的重要性，這跟韓愈〈答李翊書〉所論，基本上也是也是相同的。”

12) 見《李文公集》卷16，頁1。

除了以上李翱文論中的‘文道’觀之外，雖李翱在文中沒有以‘文’、‘道’為名，但實際上論述這一問題的還有以下兩則：

我們看他在〈寄從弟正辭書〉中說道：

d. 汝勿信人號文章為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猶誠明之必相依爾。……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懼而不為哉？¹⁴⁾

引文d中所謂的“仁義”無疑即是“古人之道”的代稱，“仁義之辭”則指在體現“古人之道”的文章而言。他認為文章應是“仁義之辭”，並提出了兩種能做到“仁義之辭”的途徑一即由“性”的與由“習”的。而又說這“性”、“習”兩者“必相依”，則表現了他對‘文’與‘道’的並重態度。至於“夫性於……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則是孔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的繼承和發展¹⁵⁾。而他接着又說：“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我們看其“仁義……內者也”則似乎重在‘道’而言，但他的側重點還是在於“吾能求而充之”，如此則又較近於“由文而後仁義者”的“習”一即屬於被宋代道家譏為‘倒學’的了。他就如此要“由文而後仁義”，但因在實際作文又無法實踐其理論，終究離不開‘藝’，故被裴度(765-839)批評為“觀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為文之病甚矣，故以雄

13)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頁143，謂：“李翱是韓門弟子。韓愈死後，李翱和皇甫湜都有哀悼紀念的文章，而二人對於韓愈的評價，却各有不同的着眼之點。李翱《祭吏部韓侍郎文》云：“嗚呼！孔子云遠，楊朱恣行，孟軻距之，乃壞於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嘗辯之，孔道益明。”這是重在道的方面講的。就是講到“文”的方面，也稱“及兄之為，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六經之學，絕而復新”。（《李文公集》十六）也是比較重在道的方面。……由于李翱與皇甫湜對於韓愈的認識不一樣，所以二人之作風和成就也不相一致。李翱作風平易，論文重道；皇甫湜作風奇特，論文也尚奇。”可見，他還是認為李翱是重‘道’於‘文’的。不過由筆者看“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後面的“開合怪駭，驅濤涌雲”部分乃是偏重於‘文’的正面形容，但郭先生不巧略而未引。

14) 見《李文公集》卷8，頁11。

15) 參見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頁145。

詞遠志，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爲意也。”¹⁶⁾，我們看了李翱的引文d之後¹⁷⁾，可知裴度是看穿了李翱論文雖看似極重視‘道’，但終究還是“以文字爲意”這一點。

我們再看另一則〈雜說上〉說：

e. 日月星辰經乎天，天之文也……志氣言語發乎人之文也。志氣不能塞天地，言語不能根教化，是人文紕繆也……人文紕繆，無久立乎天地之間，故文不可以不慎也……是以出言居乎中者，聖人之文也；倚乎中者，希聖之文也；近乎中者，賢人之文也；背而走者。蓋庸人之文也¹⁸⁾。

我們從引文e看，李翱所要求的文是：其“志氣”要“能塞天地”；其“言語”要“能根教化”者。在此他雖沒有標出‘道’字，但還是側重在‘道’而言是可想而知的。至於“居乎中”、“倚乎中”、“近乎中”的“中”指的也應該是“志氣能塞天地”、“言語能根教化”者。而他對此“中”的要求與韓愈只容許“居乎中”¹⁹⁾者比較起來，可見已寬緩許多了。

2) 創意造言，皆不相師

這‘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是李翱在他文論的代表作〈答朱載言書〉中所提出的對六經之文的一種解釋和看法，也是對韓愈〈答劉正夫書〉中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辭”²⁰⁾的修正和發展。不過因為他把重點放在“文詞之工”，所以不管他論“創意”或論“造言”都未免偏在“文詞”方面，由此又可顯見他對‘文’的重視態度。看他在這方面的論述：

16) 見《全唐文》卷538 此引自《中國文學批評資料案編》(2) 頁168, 韓愈〈寄李翱書〉中引裴度語。

17) 見〈寄李翱書〉提到〈與弟正辭書〉一文。

18) 見《李文公集》卷5 頁6。

19) 筆者認爲韓愈〈答李翱書〉“處心有道，行已有方……垂諸文而爲後世法。”；〈答尉遲生書〉“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等都有此意。

20) 見《韓昌黎文集校注》頁121。

f. 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矣。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²¹⁾

前面已說過引文f中的“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是對韓愈“師其意,不師其辭”的修正和發展,不但在其從“師”到“創”上有很大的修正和發展,而且二人所謂的‘意’的含意也不相同。韓愈因以儒家道統的傳人自許,故他所謂的‘意’即‘古聖賢人’之‘意’²²⁾,是接近儒家古聖賢之‘道’的意思,而李翱則有所不同,在他所舉的“義深”者中,竟以屈原、莊周與六經相提並論,可見他是不甚在乎儒者之‘道’的醇正與不醇正的。接着論“創意之大歸”,說道:

g. 故義深則意遠,義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恆、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腹也,其味咸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²³⁾

其義深→意遠→理辯→氣直→辭盛→文工之間的關係,可知“義深”、“意遠”都似乎在以“辭盛”、“文工”為目的而為之服務的,當然,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義深”、“意遠”乃為“辭盛”、“文工”的必需前提。所以,不管我們怎麼說,他顯然在“有意為文”則不可否認。當然,他做為文人而“有意為文”本應無可厚非,不過,他所標榜的“義深、理當”的典範不局限於儒家古聖賢,所以他所謂“創意之大歸”之“意”則不甚在乎那是否儒家古聖賢之‘意’了。他再接着論“造言之大歸”,說道:

h. 《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孟軻、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並,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

21) 見《李文公集》卷6,頁4。

22) 見《答劉正夫書》說:“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古聖賢人……師其意,不師其辭。”

23) 見《李文公集》卷6,頁4。

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韓退之曰：“陳言之務去。”……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也。²⁴⁾

看引文h，他舉六經之後的二十二家，並稱他們為“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同時把他們的文字看做是“義深”、“理當”、“詞工”之文的典範。而這二十二人裏仍還包括道家、縱橫家、兵家、墨家、辭賦家等，由此可再證實他所謂的“意”並非以儒者的為限，可知也正因此才能有可“創”的餘地的。他又從“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充分透露了“詞工”一即對‘文’的重視態度。從以上所分析的與所謂“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²⁵⁾配合觀察，則可知他所謂的“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人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²⁶⁾中的“古人”及“古人之道”也不一定是屬於儒家的古聖賢人及其道了。

以上看過了李翱較具特色及代表性的文論，可以知道他文論的側重點多在於‘文’，雖因為他身為古文家，所以在文論中常提及‘道’或類似於‘道’的字眼，但多已不局限在儒家，且在論文時很少發揮如‘道’、‘義’、‘意’、‘理’等的闡釋等方面的問題了。

此外，郭紹虞所謂“李翱論文強調語言的平易”的問題，筆者搜遍李翱的主要文論，也實在找不到這一方面的論文主張。筆者想這可能是因為李翱古文作風確有此特色，所以郭紹虞‘想當然’式地誤以為他的文論亦該如此所造成之誤。

從以上所討論可見，一般以為李翱的文論強調文以明道、語言之平易方面等說法，都有可商榷之餘地。

2、皇甫湜之文論

皇甫湜的文論特色可以歸納為：1)尚‘文’，2)尚‘奇’兩點。而尚‘奇’也就是在尚‘文’範圍里的一種特色。

24) 見《李文公集》卷6，頁4。

25) 見《李文公集》卷6，頁4。

26) 見《李文公集》卷6，頁4。

1) 尚‘文’

韓愈的古文理論，雖然因為主張文辭的創新，所以有“唯陳言之務去”²⁷⁾、“怪怪奇奇”²⁸⁾等偏向於‘文’方面的理論主張，但總得說來韓愈的古文理論及他的為文實踐均在兼顧‘文’、‘道’兩方面，而又以文章載道為其理論中心。²⁹⁾但到了皇甫湜的文論，我們可以發現已經顯然偏在‘文’。

皇甫湜的文論，可以〈諭業〉與〈答李生書〉第一、二、三等四篇文章為代表。

他的〈諭業〉篇先敘述他所認為的作文章的要略開始，然後再評論唐朝十家的文章。而〈諭業〉³⁰⁾整篇共提了四個‘道’字，我們在此先舉出來看以後，再進行分析：

- a. 夫欲利其獲,不若優其為獲之方;若欲顯其能,不若營其為顯之‘道’。
- b. 馳其華不若馳其實。彼則越趨於卿士之門,我則婆娑於聖賢之域;彼則巾車於名利之肆,我則冠屨於文史之圃。‘道’寢而後進,業成而後索。以其勞於彼,曷若勤於此。
- c. 賈常侍之文,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立于廊廟,非法不言,可以望為羽儀,資以‘道’義。
- d. 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衝飆激浪,瀚流不滯,然而施諸灌溉,或爽於用。

我們看凡在這四個‘道’字中，b的‘道’似乎較接近於韓愈所謂的‘道’，但仔細看這‘道’顯然又不專屬於儒家古聖賢之‘道’，而是偏於為文所需的修養的意思。而除此之外的‘道’字或指‘方法’，或指‘記述’等，均與儒家古聖賢之道毫無關係。由而可見，這整篇文章所述的‘為文之要’明顯地偏重於‘文’而論，至於偶爾所提及的‘道’也不是‘儒道’，所論唐朝十家之文也從偏於‘文’的角度出發評論各家文章的成

27) 見《韓昌黎文集校注》頁98〈答李翊書〉。

28) 見《韓昌黎文集校注》頁328〈送窮文〉。

29) 見《韓昌黎文集校注》頁229。

30) 見《皇甫持正集》卷1 頁7。

就。

此外，他的〈答李生書〉第一、二、三³¹⁾，三篇是具有較為系統且一貫性的文論，不過他這三篇文章裏連一個‘道’字都沒有提到。而從他的“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³²⁾看，他顯然已以‘理’來代替了‘道’，這顯然開啓了宋代古文家文論之先。不過他雖然提出來了這一‘理’字³³⁾，但他三篇所論並沒有發揮這‘理’方面的文論，而他的文論主要還是偏在文之‘奇’上面發揮。

除以上四篇文章之外，我們可窺見他論文見解的還有〈韓文公廟碑〉³⁴⁾與〈韓文公墓志銘〉³⁵⁾兩篇，雖然這兩篇並非專篇以論文為目的的，但從他對論文的評語中却透露了些對文的重要觀點。他雖在〈韓文公墓志銘〉中寫“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為書，以傳聖人之道。”點出了韓文在‘傳道’上的貢獻，但除了這麼一點之外，兩篇論文時主要還是從‘文’的角度褒揚韓愈古文的成就，表現了他偏於‘文’的文論主張。

2) 尚‘奇’

前面已說過皇甫湜的尚‘奇’主張是尚‘文’論的一種表現。而這尚‘奇’主張是從韓文在這方面文論的進一步的發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湜與李翱同出韓愈：翱得愈之醇，而湜得愈之奇崛”³⁶⁾。《文史通義》也說：“湜與李翱俱稱韓門高弟……翱得其正，湜得其奇。”³⁷⁾二書同樣點出了皇甫湜文之‘奇’與韓文的師承關係。韓文雖大部分平易可誦，但不可否認確有不少怪奇的字句和題材。怪奇也是韓文的主要的特徵³⁸⁾，但韓愈還沒有以全心全力寫怪奇的文章與文論³⁹⁾。而到了皇甫湜則毫無含蓄地提出尚‘怪、奇’的文論主張。我們看他在〈答

31) 見《皇甫持正集》卷4 頁318。

32) 見《皇甫持正集》〈答李生〉第二書 卷4 頁6

33) 〈答李生〉第一、二、三書中共用了五次‘理’字。

34) 見《皇甫持正集》卷6 頁1。

35) 見《皇甫持正集》卷6 頁6。

36) 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50。

37) 見《文史通義》華世版 頁261。

38) 見《韓愈研究》頁173。

內容，則可以得到以下四點：

第一，‘奇’若非正而無傷於正

無傷於正，而出於常→尚之可。

非常而出常

第二，‘文’即‘言之華’者，其用在通理。

第三，‘文’之“所以不朽”在“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

第四，‘文’之所以貴者，就是因為，‘文’則能‘遠’，無文即不遠也。

所以他最後的結論就是要“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並認為如此則可以“不朽”。

綜合以上四點看，皇甫湜認為可尚的‘奇’很明顯是指“言之華者”亦即‘文’而言。

他在〈答李生〉第三書中還說道：

g. 生云奇與易，作者何別，在所為耳。請考之於實；生為易矣，試為作難者，視何如相如、揚雄也。恐生乃不能，非不為也⁴³⁾。

引文g所論的內容，不外可歸納為以下兩點：

第一，從他‘奇與易’和‘難與易’的對比看，他所謂的‘奇’也非他，也就是‘難’。

第二，文之‘奇與易’不在於作者之為與不為，而在於能與不能。

以上的引文e、f、g是分別摘自〈答李生書〉第一、二、三，是較具系統性的文論，從以上引文看，皇甫湜的‘怪’、‘奇’論實際上是偏於‘文’方面的‘奇’的理論，亦即就‘詞’之高而論。而他全力發揮的‘奇’論中的‘奇’，實際指的是詞之‘華’和‘難’，故他的尚‘奇’論也就是尚‘華’和尚‘難’論。⁴⁴⁾

43) 見《皇甫持正集》卷4 頁6。

44) 以上論皇甫湜文論部分參見拙稿〈論皇甫湜、孫樵的古文特色與晚唐古文之衰落〉，《中國語文學》第46輯，頁178-183。

三、论二人主要文论的異同兼总结

我們通過以上的粗略討論再看，上面介紹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文史通義》以及郭紹虞對二人的評價，認為對皇甫湜評估大體上還是頗為中肯的，但對李翱的評價恐怕還是有不够精確的地方，故還是有我們可商榷之處。

因李翱、皇甫湜當時身為韓、柳後的古文後起之秀，故在他們文章裏，自然不乏重視‘道’的主張，不過我們通過對二人有關文論發見，無論是李翱還是皇甫湜，他們所謂的‘道’已多不是儒家古聖賢人之道，也很少發揮這一方面的文論主張，故已不是韓愈所謂的‘道’，而已與宋代古文家所謂的‘道’、‘理’非常接近。由此可見實際上他們已開啓了宋代古文家普遍以‘理’代‘道’以及‘道’的含意變得寬汎之傾向之先。

此總結前文所論如下：

一、從‘文道’觀點看李、皇甫二人文論，二人都與其說重視‘道’，不如說都偏向於‘文’，尤以皇甫湜為明顯。至於李翱的文論，偶爾言及的‘道’也已不是限於儒者之道了，故前人所謂‘得愈之醇’、‘得其正’也不過是通過二人之比較，相對而言的。二人同樣已多以‘義’、‘意’、‘理’等來替代了‘道’也是他們二人的共同點。

二、李翱的“創意造言，皆不相師”，不但是韓愈“師其意，不師其辭”的從其“師”到“創”上有大幅度的修正和發展，而且二人所謂的“意”的含義也有很大的差異。其差異在韓愈的主要指儒者古聖賢人之意；李翱則不僅以屬於儒者為限。如此，則儒家之道的意味趨於淡薄，故他們的文論就相對偏於‘文’，而作者之‘意’的可‘創’的餘地就更增加了。

三、皇甫湜的‘怪奇’論，也就是他尚‘文’主張的一種積極表現。而此‘怪奇’論實際上是尚‘奇’論，如此，他的文論則更偏向於‘文’了。經過前文的分析看，這‘奇’原來是‘華’與‘難’，故我們可以說尚‘奇’論原來就是尚‘華’、尚‘難’論了。

李翱論文雖與皇甫湜一樣，偏於‘文’而主張言語之創新，但他還沒有‘怪奇’的

主張。這又是與皇甫不同之處。

此外，郭紹虞所謂的“李翱論文，強調文以明道與語言平易這方面。”，筆者想是有可商榷的餘地的。筆者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郭先生此番話，但我們不能簡單接受這種評語，應從細節上再觀察一番。筆者看，在李翱的文論中確有‘明道’這一方面的論調，⁴⁵⁾但還說不上‘強調’，至於其“語言平易”，是李翱古文的作風，在其文論中則找不到類似的主張，因此筆者懷疑郭紹虞說李翱文論強調“語言平易”可能是就其作風而言。

45) 李翱的文章裏面也不乏言及“道”的，但如〈復性書〉等文章，因其立腳點不在文章，故所謂“道”也不是“文”、“道”關係上的“道”，所以我們也應當區別開來討論。

參考文獻

- 唐 李翱, 李文公集, 《四庫全書》版
- 唐 皇甫湜, 皇甫持正集, 《四庫全書》版
- 馬通伯校注, 韓昌黎文集校注, 中華書局 1984
- 清 章學誠, 文史通義, 臺北, 華世出版社 1980
- 清 永瑢、紀昀主編, 四庫全書總目, 中華書局 1965
- 羅聯添編, 中國文學批評資料匯編(隋唐五代), 臺北, 成文出版社 1978
- 郭紹虞編著, 中國歷代文論選,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 郭紹虞, 中國文學批評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羅根澤, 中國文學批評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 郭紹虞, 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 臺北, 丹青圖書有限公司 1985
- 羅聯添, 唐代文學論文集(上冊), 臺北, 學生書局 1988
- 羅聯添, 韓愈研究, 臺北, 學生書局 1988
- 何寄澎, 唐宋古文新探, 臺北, 大安出版社 1990
- 周祖譔編, 隋唐五代文論選,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9
- 李道英, 唐宋古文研究,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1
- 王基倫, 唐宋古文論集, 臺北, 里仁書局, 2001
- 兵界勇, 韓文「載道」與「去陳言」之研究, 臺灣大學碩士論文, 1994
- 黃潔潔, 韓門弟子研究, 華東師範大學 碩士論文, 2005
- 兵界勇, 唐代散文演變關鍵之研究, 臺灣大學博士論文, 2005
- 李發亮, 皇甫湜的生平與創作, 華中科技大學碩士論文, 2007
- 成松柳, 從“文以載道”到“抒寫性靈”－唐宋散文的傳承與拓展, 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 1995
- 兵界勇, 論《唐文粹》「古文」類的文體性質與其代表意義, 中國文學研究 第14期, 2000
- 安贊淳, 論皇甫湜、孫樵的古文特色與晚唐古文之衰落, 中國語文學, 第46輯 2005
- 繆鉞, 新散文的興起-唐代古文, 繆鉞 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6年 第

4期(總第145期)

朱麗霞, 從韓愈古文運動的失敗看唐代駢文的文体地位, 學術月刊, 2007年第7期

莫道才, 唐代“古文運動”概念平質, 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0年第5期

<ABSTRACT>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Li'ao(李翱)and Huangfushi(皇甫湜)'s Guwen(古文) theory

An, Chansoon

In China's Tang dynasty, predecessors recognized Li'ao (李翱) and Huangfushi (皇甫湜) are inheritors of Hanyu (韩愈) paleography(古文) and evaluated that "Li'ao succeeded to the purity and Huangfushi was initiated into unique, too.

On the other hand, Guoshaoyu (郭绍虞) was also succeeded to Hanyu's paleography by two following of disciples who are Li'ao and Huangfushi.

Moreover, the literature and creation of Huangfushi was focused on language's unique and Li'ao's literature was emphatic on the ' wenyimingdao (文以明道) ' or simple language (平易), etc.

However, after our examining conscientiously on Li'ao & Huangfushi's main opinions about their literature & theory, we find that two scholars are confident they was initiated in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Hanyu's archaic literature each other, but we know predecessors evaluated that two scholars made big contribution in comparative evaluation. In general, two scholars's literature and theory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that they are overly weighted toward Wen(文) than Tao (道) . As Guoshaoyu mentioned, the literature & theory of Li'ao have been recognized that he emphasized the ' wenyimingdao (文以明道) ' or simple language (平易), etc. but when I examine carefully, there is no such insistence or emphasis. Therefore, I guess Guoshaoyu misunderstand that the creation trend of Li'ao insisted on the literature & theory itself.

Generally, two scholars are sure of different two trends of the literature, but they was surely interested in archaic writers' literature & theory in Sung dynasty rather than succeeded to Hanyu's literal arts opinions.

Key words : LI'AO(李翱), HUANG FUSHI(皇甫湜), GUWEN(古文), Tao(道), Li(理)

투 고 일 : 2012. 5. 10. / 심 사 일 : 2012. 5. 20. ~ 2012. 6.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2. 6. 15.